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本质

胡华强

(南京林业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 江苏 南京 210037)

摘 要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重要的基础性的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检验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践经验和最新理论成果,结合中国国情和新的形势,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念体系的过程。本文论述了以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必然性、重要向度的合理性和基本路径的现实意义,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本质,阐述了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本质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1)04-0009-04

马克思主义将实践概念作为理论的基础和发展动力,同时也将实践作为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将实践作为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基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也必然将实践问题作为基础核心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实践视角进行解释和理解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及发展规律的。何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略地讲,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由此产生的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理论,这一过程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因此,从实践视阈诠释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既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的、本质的、现实的要求,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需求的必然结论。

一、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可以从两个层次进行分析:一个是基础理论层次,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其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的全面而系统的阐释和展开;另一个层次是实践应用层次,即是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应用在实践中,在实践中不断发现、分析并解决的问题,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体系进行充实、修正、促进和提高。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不同历史时期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的理论总结。基础理论层次中由范畴、推理和判断构成的理论体系为实践过程中认识和发现问题提供基本

法则,而实践应用层次则是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了的指导实践的策略主张。

基础理论层次与实践应用层次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结的。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基础理论不等于现实,能否成为现实及如何成为现实,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受到客观的现实环境条件的制约。实践应用层次是基础理论应用于客观的现实环境条件的过程,不仅要受到客观的现实环境条件的剪裁和选择,而且只能融其精髓,存其本质。因此,实践形态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本质。

构成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3个理论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创始人构建基础理论之初,理论体系的科学论证是其主要任务。虽然科学社会主义则为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提出了一些具体结论,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实践的具体原则和方法,但是从构建这样一个理论体系的主要任务和根本目的来看,还是侧重于对无产阶级解放作充分的逻辑论证和现实合理性的辩护。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成功构建先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的成功实施,所以,基础理论的早期实践及由此产生的问题意识也只是限于现实的可能性的分析和论证,无法对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进行具体的指导和解答,无法制定实践的具体策略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需要通过后续的成功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检验而得到最终的证明,这是马克思主义必然的发展逻辑。不仅需要在新形势下从理论上不断对基础理论进行丰富、调整、发展,而

且需要根据新形势的要求在实践上发现、分析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总结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成功的经验,为基础理论的普遍真理提供现实的强有力的支撑,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科学而不是空想。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理论成果带来的结构和内容上的新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方法的完善、方案的完备的实践需要,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内在实践本性的必然要求,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提出实践原则和具体的实践规划,才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现实而不是理想。这一历史发展的逻辑合理性和科学性取决于是否坚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取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实践化程度和水平。

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看,我们需要的不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能够解决实践问题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完善,也是解决实践矛盾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民族化过程使科学社会主义成为一种现实的运动而不仅仅只是构建一种理论的大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应用层次的策略化价值和目标,也使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包括认识和改造世界双重意义的实践功能性理论^[2]。

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向度

社会科学领域中,向度是指事物显在或潜在的不同指向的特征。在事物客观存在的多种向度中,实践向度是指事物在实践领域中的特征,在实践向度上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以实践为视阈去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形态特性、经验规律等^[3]。

实践向度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视阈,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要进行研究范式的转变在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研究范式的转变意味着研究视阈的转变,国内外学者从国情、国际形势、政党制度、文化、经济等众多视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不同视角的诠释和总结,但是,无论范式从哪个视阈切入研究,都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实践这一视阈。

党内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性是毛泽东,他在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说:“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

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4]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却始于20世纪初,从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被首先发生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所震撼,体验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实践成就,这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长期存在、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应该归结于其实践的本质和力量。中国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实践真实的认可,使他们开始学习、探究并最终信服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被中国民众接受并传播,是因为它能够满足中国民众现实的、迫切的、强烈的、合理的救国图强需要,是实践成功的经验促成其在中国社会的传播而不是基于其理论的内在力量。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初始阶段就是因为其被中国民众当做改变国家近现代屈辱而悲惨的命运、拯救中华民族、强国兴国的措施,被早期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当做破解中国社会发展困境和迷局的思想武器,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性和实践性体现最充分。虽然马克思主义是严谨而博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人们认同的是其改造社会的强大的功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开始于实践的力量,丰富和发展于在中国的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此时,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合理性存在有赖于疏离理性力量的感性情结和朦胧的客观真实性认可,这也成为后期党内教条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现实社会前提,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国改革开放才有所转变。期间虽然也有人发出了要从理论上走近马克思的声音,但是从本质上看,也只是更倾向于从策略和手段的高度认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存在而不是折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缜密和科学,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目的也产生理解上的偏差。我们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不能忽视其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现实基础,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向度,不能无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不能轻视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作用,不能跳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实践范式。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轨迹进行分析,马克思主义自身只有不断参与中国社会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并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理论力量,不断发现中国社会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问题,科学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成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向性、指导性的原则和意见,才能获得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和价值体现,这样才能找到其不断与中国国情、民情、社情相结合的契合点,才能真正做到民族化和本土

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源”的认识;“根”在实践及实践中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的探究;“径”在与实践的对话、互动。因此,实践对理论的“启发”、理论对实践的“领悟”是“中国化”研究的必然的、自然的方式^[2]。

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也非常重视实践向度的把握。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实践本质得到充分体现,实践向度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理论与实践是相互结合并转化的,理论的主观性和静止性是相对的,实践的客观性和发展性是绝对的,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中,实践决定理论,理论决定于实践。理论的具体结论要接受实践的修正和检验,新的形势、实践活动、社会发展阶段如果产生了新的理论,原有的理论将被取代,所以,在实践推动下,理论呈现出从绝对走向相对,再从相对趋向更高层次的绝对的发展过程。因此,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认识结论,从实践出发形成的阶段性理论认识判断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确定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只有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完善和发展的理论才成为可靠的理论,才能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体现价值。这一过程中,实践既是起点也是终点。理论研究中忽视实践向度,无法超越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和矛盾的解决。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理论奠基人提供合理的理论范式作为思考和分析的基础,而且还需要不同阶段针对社会事实的,以确认理论实践的可能性、可行性的实践向度来提供保证。

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路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人类社会规律改造并建设对中国社会的实践化过程或者是实践的、系统化的、理论性的阐述。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前后四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坚定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造的伟大实践,由此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两次理论飞跃,产生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重视实践路径理论表达,可以称之为实践思维,它们都是不同历史阶段和历史条件下探索解决中国实践问题形成的实践的策略、实践的理论化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形成的解放思想成果,江泽

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凸显的与时俱进理念,胡锦涛在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科学发展观,无一不是在中国社会实践中“化”马克思主义的体现。科学发展观更是以实践为关键路径并且只能通过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的时代课题。这些理论成果的共同特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对自然和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人类共同价值观,在实践思维中转化为政党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和指导原则,通过具体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细化实施方案的制定来回应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现实诉求,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充分凸显其实践本质^[6]。

中国改革发展实践虽然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两次理论飞跃,同时也造成了社会民众的疑虑和担心,即在中国改革发展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现实之间是否会脱节,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对这个问题解决的不好,有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中国实践中的地位动摇,会使社会民众产生执政党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开历史倒车的疑虑,影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民众对其认同感的下降,甚至怀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理解基于实践视角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明确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有机联系的问题。

方法论就是关于方法的本质和特征的理论。方法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解决问题时使用的手段、工具和技术的方式,它使用效果的成败和大小,有赖于人类对实践对象的内在的、本质的规律的认识和顺应。方法论是研究利用实践对象客观规律对其进行改造的理论。方法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一般与个别的矛盾统一体。从特殊性和个别的角度看,方法不具有通用性,因为实践对象的不同、实践条件的不同以及实践目的的不同采取的方法也必然有所差别,从共性和一般的角度看,方法又具有共同的特征和相同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作为方法论,只是提供人们理解、掌握和运用具体方法的思想指导,是处理和对待主观思想和客观物质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要求,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实践对象,要求人们遵循客观规律方面发挥其相应的作用^[7]。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因自身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系统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且经过有组织的、复杂的现实社会实践的检验,已被证明其对社会实践的指导地位不容动摇。人们虽然有可能因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产生原则性

要求和具体实施方法统一的困难和疑惑,但是不能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精神、观念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产生质疑和否定,改弦易辙,另寻捷径。这种困惑和疑虑是对于方法辩证本质的不解、误解甚至是曲解,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结论的区分产生困难。中国化的前提是对经过实践检验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认可和接受。

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本质地位不仅是其科学性的具体体现,而且也决定了从其基本理论体系结合实际形成的应用性策略层次的理论成果同样具有普遍的价值意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的联系是相通的、内在的和必然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策略性理论成果的存在不仅体现了经过社会实践检验的客观性和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体系内在的、必然的同时也是合理的逻辑性,而且这种客观性和逻辑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进一步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再次证明了实践本质使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活力。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同时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始终贯穿的就是对实践的强调和重视;“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客观标准”、“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等观念不仅在理论内容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在制定的具体策略中不断被强调和重视。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本质与中国特色的实践策略的内在统一,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路径,也应当确定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可动摇的主体地位。

四、结 语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立足于社会实践,是深刻揭

示自然和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的先进理论,是致力于共产主义社会远大目标的实践理性方式的学说,他们强调理论的实践价值及两者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仅使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完成了从空想变成理想的转变,而且在实践中也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现实。马克思把彻底改造世界尤其是人类社会自身作为认识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始于实践也终于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能够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本质并把实践作为其基本原则和要求,不断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中国的社会实践为逻辑起点,立足于中国社会现状、形势和国情,把实践看成自身发展的动力和必然路径,不断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理念体系,使马克思主义不断活力。

参考文献:

[1] 申心刚.从实践性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6.
[2] 丁素.实践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学习论坛,2007(1):10-13.
[3] 游冬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向度:特性、方式与环境[J].江西社会科学,2011(4):241-244.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白煜,杨成敏.第三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论坛综述[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2(1):82-85.
[7] 黄明理,赵政委,戴锐.论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与其大众化的内在逻辑[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3):41-44.

· 简讯 ·

河海大学施国庆教授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论文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移民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施国庆教授在2011年10月28日出版的第334期《Science》(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与国外学者合作的论文《准备气候变化相关的移民》。

施国庆教授在这篇与美国、法国、巴西、印度等国以及国际移民组织、关怀国际等国际组织的专家合作,历时一年完成的论文中认为,虽然有气候变化将导致人口迁移的共识,但对潜在的流动规模,包括可能的来源地和目的地、气候相对其他因素对迁移活动中的作用以及移民是否代表了一个失败的适应等方面仍然有不同看法。文章认为,减轻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会导致严重的人口迁移的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移民作为一种适应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关键是要从开发项目导致的移民安置活动中学习和借鉴。论文讨论了气候影响和减轻与适应气候变化而进行的大规模项目等两大类潜在的气候变化移民响应,讨论了移民政策、途径,针对缺乏社区资源进行移民等问题,对有组织的移民提出了建议。

(本刊编辑部 供稿)